

武亿方志学成果述略*

甘良勇

提 要: 作为乾嘉汉学在中原地区的标志性人物——武亿,在经学、金石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在方志学领域,武亿也成果斐然。自乾隆六十年(1795)以后,武亿应邀先后主持嘉庆《鲁山县志》《宝丰县志》《安阳县志》3种地方志的纂修工作。三志的发凡起例、人员组织,均由武亿一人负责。三志修成,因其义例谨严、资料丰富,成为方志纂修的标志性范本。同时,在三志的纂修过程中,对方志体例、修志材料的搜集等,武亿也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,成为清代方志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资源。

关键词: 武亿 方志纂修 方志理论

武亿(1745—1799),字虚谷,一字小石,自号半石山人,又号授堂,河南偃师人,学者多称授堂先生。武亿是乾嘉时期中原地区乾嘉学派著名学者,在张之洞编纂的《书目答问》附录二《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》中既列名经学家、又列名金石学家的中原学者,仅武亿一人。武亿在经学、金石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,孙星衍评价他:“通贯经籍,讲学依据汉儒师授,不蹈宋明人空虚臆说之习。……今中州人知读古书,崇经学,搜访碑刻,备一方掌故,多自亿始为倡始云。”^①可见他的成就在当时就得到并世学人的承认和推崇。

武亿秉承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,学风朴实无华,不事空谈。他尤喜探讨方輿之学,保存在其文集内的有《古郑国处留辩》《汉王商邑居辩》《鲁山考》等,抉幽阐微,显示了他极高的方輿学水平。另外,武亿还特别重视金石材料在方志纂修中的作用。在托名钱献之的《偃师金石遗文补录序》中,他说:“金石之文,取以证地理,其系于方志者,尤为著名。邠中尉注《水经》,实能详识碑刻所在,以表故城旧界,俾人寻览易征其迹,后之得是意者,盖鲜有闻焉。”^②金石材料,记载当地风土人情、历史变迁、地理沿革,在方志纂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乾隆五十一年(1786),著名学者孙星衍应偃师县令汤毓倬聘请,主持纂修乾隆《偃师县志》,然全书未成。第二年孙星衍赴京参加会试,向汤毓倬推荐武亿代替自己完成乾隆《偃师县志》的纂修。与此同时,河南府知府刘文徽亦向汤毓倬推荐人选。为了避免人事纠纷,武亿婉拒了汤毓倬邀其担任主纂的请求,但是汤毓倬仍然将《金石志》部分委托给武亿来撰写。武亿根据所见及家中旧藏,选取80余种材料,撰成《偃师金石录》2卷,收入乾隆《偃师县志》卷27、卷28。陈鸿森评价此书说:“此书之例,其碑见存者,具录其文,注其字体、见存处所,其书撰人、年月可考者,并详记之;佚者记其出处。各附案跋,考证极为详悉,足存一方之文献。”^③

*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《武亿全集》点校整理及武亿学术成就研究”(项目编号:2017-ZZJH-419)研究成果之一。

① 孙星衍:《武亿传》,《五松园文稿》卷1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1477册,第487页。

② 武亿:《偃师金石遗文补录序》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道光二十三年(1843)《授堂遗书》本,2007年,第3册,第501页。

③ 陈鸿森:《武亿年谱》,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,第85本,2014年,第3分册,第514页。

重视金石材料在方志纂修中的作用,是武亿方志学的最大特色。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武亿秉公执法,痛笞权相和珅派遣到山东的番役,被上司弹劾,在山东博山县县令任上去职,从此开始了他讲学四方、主持方志纂修的学术经历。

一 主持纂修嘉庆《鲁山县志》

乾隆六十年,河南鲁山县知县董作栋遣人奉币邀请武亿到鲁山撰修《鲁山县志》,武亿应约欣然前往。董作栋,字工求,号书巢,浙江余杭人,乾隆四十三年(1778)戊戌科进士,授直隶庆云县知县,因丁母忧,未赴任。直至乾隆五十七年,董作栋应吏部铨选,实授河南鲁山县知县。上任之后,董作栋“兴学校、清民逋、创书院、修邑志、敛豪强”^①,政声颇著,受到百姓爱戴。鲁山县修志,首轍于明嘉靖三十年(1551),二修于康熙三十二年(1693),三修于乾隆八年。董作栋莅任鲁山县知县,据上次《鲁山县志》的纂修,已逾50载,按照清政府60年一修的规定,《鲁山县志》到了重修的时候。董作栋上任伊始,即以纂修县志为己任。他说:“鲁邑志乘,自乾隆八年重修,今五十余载矣。疆域不殊,人文辈起。予于乾隆壬子,承乏是邦,披阅旧志。进邑之贤大夫询问掌故,思加订正。”^②武亿担任新志总纂以后,组织了参订谢珍、符元德,分纂宋锡珪等19人,采访李步青等50人,共计73人的写作团队,诸人分工合作,在武亿的领导下,一年时间,新志即告完成。

嘉庆《鲁山县志》有纪、图、表、志、传、记6种体裁。纪包括圣制纪、帝赉纪2种,图包括县域总图、分图、山川图、渠田图4种,表包括沿革表、爵封表、职官表、选举表4种,志分为地理志、典祀志、田赋志、兵防志、水利志、艺文志、金石志7种,传分为史传、集传、列传、列女传4种,记分为循政记、大事记2种,共26卷。个别门类因为内容较为繁复,下面又设子目。比如《地理志》,其下设沿革、疆域、山川、建置、古迹、里甲、风土、物产、莖墓9个子目。

相对于乾隆《鲁山县志》,嘉庆《鲁山县志》从体例上作了两个改变。首先,“旧志所载诗文,今归入建置、古迹。依范致能《吴郡志》例,文繁不杀,最为典据”^③。乾隆《鲁山县志》诗文单列一卷,而武亿创新原志的体例,将这些描写记录鲁山名胜古迹的诗文分列于《地理志》下的建置、古迹。例如建置类下,在引用《河南通志》、乾隆《鲁山县志》的相关文字记述鲁山县城形制之后,紧接着引用谢江《鲁山县城碑记》、袁象斗《增修鲁北城记》、王之晋《鲁山县大筑城垣记》3篇,记录鲁山县城在3个不同时期的修葺情况。这种做法,原本仅仅用于怀物抒情的文学性文字,发挥了考察历史事实的资料性价值,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。这样的安排,体现了武亿对于文献资料使用的敏锐眼光。

由于武亿本身的学术趣味,他对金石文献特别重视。创设《金石志》,是嘉庆《鲁山县志》区别于前志的另一个特点。如前所述,武亿是蜚声当时的金石学家,对于金石材料在方志纂修中的作用,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。武亿认为:“采辑金石遗文,与县中墟聚、里居、山川、关隘对证互见。实史志所未载,反得散见于此,是以不憚博引详稽,取为方志之要。”^④在新撰修的方

① 龚嘉雋:《杭州府志》,“中国方志丛书”,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,1974年,影印民国11年(1922)铅印本,第2613页。

② 董作栋:嘉庆《鲁山县志·序》,1984年标点本,第3页。

③ 武亿:嘉庆《鲁山县志·凡例》,第4页。

④ 武亿:嘉庆《鲁山县志·凡例》,第4页。

志中,卷17—20皆为《金石志》,收录周代至明代鲁山县历史上存在或出土的金石材料,约占全书篇幅的1/6。对于每一则材料,武亿不仅是对金石文献简单的录入,对材料的内容以及价值,还做了详细的考辨,尽量发挥每一则材料的史料价值。例如卷18《重修观音院记》,在《碑阴记》录文后,武亿考证说:“碑称‘省除汴梁路陈留县务付,省除南阳府鲁山县务付,省除南阳府儒学教谕,省除南阳府鲁山县典史’。凡四见‘省除’,当由行省除授,其亦一时权宜之设欤?清议大夫、清训大夫,《元史·百官志》文散官四十二阶,无之可据,以补史遗。”^①这座立于鲁山县观音院的碑刻,涉及元代的两个职官:一是行省的授官问题,二是碑文所载文散官名称不见于《元史·百官志》所记录的文散官四十二阶。碑文中所记载的这些内容,对于元代职官制度研究,无疑是宝贵的。

嘉庆《鲁山县志》撰成以后,由于义例严谨,材料丰富,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。后人高度评价此志说:“所作各表,备极精详。凡有事迹可书者,《职官》外为《循政记》,《选举》外为《史传》《集传》《列传》诸目,余俱列表,年经月纬,颇便稽考。……旧志所载诗文,此编悉归建置、古迹,依范致能《吴郡志》例,最为典据。又采辑金石遗文,与县中墟聚里居、山川关隘,互相对证,尤为邑志所未有,盖名人手笔,究与寻常不同也!”^②

二 主持纂修嘉庆《宝丰县志》

嘉庆《鲁山县志》纂修完成以后,应时任宝丰县县令陆蓉之邀,武亿主持纂修了嘉庆《宝丰县志》。陆蓉,号镜堂,吴县人,乾隆甲午科(1774)孝廉,工山水画,笔法取法元代大画家黄公望,为人豪爽。对于邀请武亿主持修志的经过,陆蓉说:“蓉忝宰斯邑,读马君旧志,亦云赅矣。而中有未尽合者,窃欲损益之,为簿书所扰,因循十稔,迄未有成。……丙辰(笔者注:1796年)春,汝州行馆与董鲁山书巢剪烛夜话,偶言及此,喜有同心,遂延偃师武子虚谷肩厥事,馆诸鲁阳之琴台,先鲁后宝,次第纂修。”^③宝丰县志,首修于清顺治,重修于康熙,三修于乾隆五年(1740),陆蓉提到的“马志”,即指乾隆五年由马格主持纂修的乾隆《宝丰县志》。丙辰,即嘉庆元年(1796),距离上一次修志已近60年,是清政府规定的方志60年一修的期限。陆蓉任县令以来,便汲汲于此事,宝丰与鲁山两县毗邻,陆蓉与董作栋相熟,因此延聘武亿修志,就顺理成章。因为有了嘉庆《鲁山县志》的编修经验,武亿主持纂修嘉庆《宝丰县志》只用了短短10个月时间,即告修竣。

嘉庆《宝丰县志》也由纪、图、表、志、传、记6种体裁组成。纪包括宸翰纪、帝赉纪2种,图包括县域总图、分图、山川图3种,表包括沿革表、职官表(附《武职官表》)、选举表(附《爵封》)3种,志包括地理志、建置志、典祀志、田赋志、兵防志、金石志6种,传包括史传(附《集传》)、列传、列女传3种,记包括循政记、大事记(附前志叙传)2种。嘉庆《宝丰县志》体例与嘉庆《鲁山县志》除了个别门目做了一些调整外,比如《建置志》,嘉庆《鲁山县志》隶属于《地理志》下,而嘉庆《宝丰县志》单独设为一类,其他基本相同,两书可以说是姊妹篇。

依嘉庆《鲁山县志》例,武亿在修纂嘉庆《宝丰县志》时候,依然将旧志诗文散入山川、古迹、建置等类下,“因文考见,其义自明”。同时,武亿仍旧强调金石文献的资料价值。他认

① 武亿:嘉庆《鲁山县志》,第195页。

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整理: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齐鲁书社,1996年,第8册,第435页。

③ 陆蓉:嘉庆《宝丰县志·序》,嘉庆二年(1797)刻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为：“金石文字为一方文献之要，中有地名、故事，既系乡邦旧闻，又多与史志相证明。今具述本文，后列案语，用资好古之助。”^①虽然武亿纂修嘉庆《宝丰县志》时，驻扎在鲁山县琴台，但是依然“命其徒求钟鼎于应滨，摹碑碣于蔓草”，大力搜集宝丰县的金石文献。该志撰成后，金石志部分共有5卷，占全书总卷数的1/4。在该志的其他部分，资料丰富，考证详明。例如卷13《兵防志》中，元代部分有“元士兵”一条，引《元史·百官志》：“至正十四年五月，置南阳、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，万户府募土人为军，免其差役，令讨贼自効。先是，乡人自相团结，号毛葫芦，故因以名之。”又引《元史·顺帝纪》：“至正十四年，立南阳、邓州等处毛葫芦义兵，万户募土人为军，免其差役。令讨贼自效，因其乡人自相团结，号毛葫芦，故以名之。”又引《大学衍义补》：“今唐、邓山居者，以毒药渍矢以射兽，应弦而倒，谓之毛葫芦。”毛葫芦究竟作何解释，前两则材料语焉不详，第三则材料似是而非，武亿考证后说：“案，毛葫芦之制见《朵而直班传》，朵而直班督诸军，复商州，乃修筑奉元城垒，募民为兵，出库所藏银为大钱，射而中的者赏之，由是人皆为精兵。金商义兵以兽皮为矢房，状如瓠，号毛葫芦。军甚精锐，列其功以闻，赐敕书褒奖之。由是，其军遂盛，而国家获其用。”^②元代政府在中原地区招募军队，对于“毛葫芦”一词，皆语焉不详。武亿通过考证，指出这是一支善于射箭的军队，因用兽皮制成随身携带的箭筒，故称为“毛葫芦军”。这则材料对于研究元代兵制，以及研究地方军队训练情况，无疑是极为珍贵的材料。

嘉庆《宝丰县志》体例谨严，资料丰富。后人评价此志说：“是志勤于文献与碑石采集，考据颇精。……金石为最尤，共六卷，占全书四分之一，自周迄明，搜集之丰富非一般志书可比。”^③评价可谓公允。

三 主持纂修嘉庆《安阳县志》

嘉庆三年（1798），武亿在老友赵希璜的邀请下，又主持纂修了嘉庆《安阳县志》。赵希璜，字子璞，一字渭川，广东长宁人，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己亥科举人。乾隆五十七年，赵希璜由河南夏邑县令调任安阳县令，即着手安阳县志的修纂工作。关于此志的纂修经历，赵希璜说：“是志始纂于康熙三十一年安阳县知县马君国桢，再纂于乾隆三年安阳县知县陈君锡谔，阅今又六十年矣。希璜于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由夏邑调任安阳。次年癸丑，延太仓王明经开。次年，延兴县康舍人仪钧同纂。斯志尚未成书，而希璜调署济源，稿经散失。去年戊午，偃师老友虚谷武君亿过从与之，商榷考据，为图为表为志为传为记，体例凡五，而另编为录，博取金石以资考证。”^④嘉庆《安阳县志》署名武亿、赵希璜同纂。对于两人的分工，赵希璜说：“图、表、志、传、记，凡十四卷，录凡十二卷。其考据经史，旁求金石，虚谷之力居多。至于纲举目张，条分缕析，希璜盖七阅寒暑而后成此书矣。”然而据武亿之子武穆淳说：“赵君本知名士，复延偃师徵君武虚谷先生代为捉刀，闻山川古迹、地理形胜，以至金石之搜剔、稗野之旧闻，皆征君手辑之。”^⑤由此可知，嘉庆《安阳县志》从体例的安排，到材料的搜集、内容的撰写，皆出于武亿之手。

① 武亿：嘉庆《宝丰县志·凡例》。

② 武亿：嘉庆《宝丰县志》卷13。

③ 金恩辉、胡述兆：《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》第6《河南省》，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，1996年，第40页。

④ 赵希璜：嘉庆《安阳县志·序》，嘉庆二年刻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⑤ 武穆淳：《重修安阳县志·序》，《授堂遗书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4册，第265页。

嘉庆《安阳县志》依照嘉庆《鲁山县志》和嘉庆《宝丰县志》体例，由图、表、志、传、记5种体裁编纂而成。图包括县境总图、分图、渠田图3种，表包括沿革表、爵封表、职官表、选举表4种，志包括地理志、田赋志、渠田志、典祀志、兵防志、古迹志6种，传包括集传、列传、叙传、列女4种，记包括循政记、节孝记2种，最后附以艺文。与前两志最大的不同，安阳历史悠久，当地出土的金石资料众多，将金石部分辑入志中，势必造成县志各部分内容的不相称，所以武亿另编辑《安阳县金石录》12卷作为补充。

嘉庆《安阳县志》问世以后，即以资料丰富，考证精详著称，被誉为名志。纪昀对此志给予极高的评价，他说：

修地志者相延之通弊，则莫大于夸饰，莫滥于攀附：一夸饰而古迹人物辗转附会，一攀附而琐屑之事迹、庸沓之诗文相连而登。余尝叨预修国史，是当代志书之所聚也。又尝叨校四库书，是古来志书之所聚也。……其体例谨严，考证详确者，千百之一二耳。……（《安阳县志》）其目井井有条，多合古法。……先以图次以表挈其纲矣，次以志次以传次以记，析其目矣。殿以《艺文》，乃仿古人之目录，不似近人之附载诗文，其体例不亦善乎？而每条必有考证，不徒杂袭乎旧文，其叙述不亦确乎？最擅长者，在附《安阳金石录》十三卷。……以赵君此志为地志之通例可也。^①

纪昀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，曾预修国史，担任《四库全书》馆总裁，所阅方志不可谓不多，深知地方志书的弊端所在。他对嘉庆《安阳县志》的高度评价，固然有其学术趣味使然，但评价还是符合史实，比较客观公正的。

结 语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出武亿方志学的两个特点。一是在方志材料的选择上，武亿非常重视金石材料在方志纂修中的作用。每纂修一地方志，武亿总是大力搜集当地的金石文献，整理考辨，充分发挥这些材料记录当地历史、风土人情中的文献价值。二是在方志体例的设置上，武亿重视图、表、志、传等体例的配合，将方志中的诗文附录在相关内容下，使得材料与体例相适应，体现出他迥异于一般修志人员因循守旧的史识。由武亿主持纂修的嘉庆《鲁山县志》、嘉庆《宝丰县志》、嘉庆《安阳县志》是清代方志著作中的优秀之作。武亿的方志学理论也是清代方志学理论中的宝贵资源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新乡学院文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詹利萍

^① 纪昀：《安阳县志·序》，《纪文达公遗集》卷8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1435册，第347页。